

太虛大師與人間佛教

——為太虛大師研究會會刊而作（四）

潘文彥

正當太虛大師積極發展之佛教事業，在全國蓬勃興起之時，祖國遭受日本帝國主義的野蠻侵略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，太虛大師遂即發表《為瀋陽事件告臺灣、朝鮮、日本四千萬佛教民衆書》，呼籲廣大佛教民衆團結起來，抵制一切侵略戰爭。一九三六年七月太虛大師致函民衆訓練部，請改僧尼軍訓為救護隊訓練，以符合佛教宗旨。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，其時太虛大師在廬山，憤然之情，溢於詩作：

心海騰宿浪，風雨遇孤燈。
卅載知憂世，廿年勵救僧。
終看魔有勇，忍說佛無能。
擲筆三興歎，仰天一撫膺。

七月十六日，大師又發表《告全日本佛教徒衆》和《告全國佛教徒》兩篇電文，號召廣大佛教徒，本著慈悲情懷，投入到抗戰洪流中去。全面的抗日戰爭爆發。

太虛大師退居重慶縉雲山漢藏教理院，一邊繼續弘揚佛法，一邊積極參加抗日。抗日戰爭期間，太虛大師倡議成立僧伽救護隊，爲了共紓國難，他勉勵佛教徒要自救救人，做種種利益人民大眾的事；一九三九年十月，國民政府函聘太虛大師爲國際佛教訪問團團長，命其組團出訪南亞和東南亞國家，以加強國際反日陣線，爭取國際上對我抗戰之聲援。他於是跋山涉水，遠走各國宣揚佛教救世精神，先後訪問緬甸、印度、錫蘭（斯里蘭卡）、星洲（新加坡）、馬來西亞、越南等國家的多個地區，在到訪地的歡迎集會、佛教法會、高等學府多次發表演說，宣示中華民族與中國佛教徒正在爲獨立生存和公平正義而鬥爭。以大師在國際上的地位，會見到訪國政府首腦，如與甘地、尼赫魯和泰戈爾等軍政要人、社會名流、宗教人士和華僑領袖各方面人物，就反對侵略，爭取世界和平，以及加強佛教文化交流活動等問題交換意見，贏得了到訪國人民對中國抗戰的同情和支持，

爭取國際上對我抗日戰爭的援助，取得成功，最明顯的是，使得西南抗戰大動脈——滇緬公路得以重新順利開通。一九四五年，太虛大師發表《告日本四千萬佛教徒》廣播演將，勸日本無條件投降，凡此種種，充分體現了太虛大師高尚的愛國愛教情操和深厚的民族感情。

抗戰勝利，全國一片歡騰。一九四六年元旦，國民政府嘉勉太虛大師在抗日戰爭中所作出的重大貢獻，頒法給他抗戰勝利勳章，四月，復員返回南京，太虛大師為整頓中國佛教會，重建新型佛教團體，以急切的心情趕赴鎮江焦山倡辦僧才訓練班，八月結業。他自己親自執教《中國佛教史》，後由他的門下根據記錄，整理成《中國佛學》，共五章。篇目依次為：第一章、緒論；第二章、中國佛學特質在禪；第三章、禪觀行演為台賢教；第四章、禪台賢流歸淨土行；第五章、中國佛學之重建。

太虛大師在緒論中，論述了大乘佛法的本質，分析了證法和教法的關係。他說：「大乘以佛為本：大乘法即自證法，亦即依佛本願力以教化眾生的法。」佛法以覺悟為本，怎麼才能得到這個「本」？那就是通過信解行證和教理行果的修證程式。佛法來自佛的證法，通過佛的所證、所教，現在我們所學、所行，最後歸結為證

法，回歸到佛所悟到的真理。所以，佛法是可說，可行、可證。正是基於這一點，太虛大師說，中國佛學是大乘佛學，本於佛的自內證，所以中國佛學的特質在於禪。

禪，在中國佛教史上分為兩類：依教修心的教下禪和悟性成佛的宗門禪。太虛大師談到教下各派中，最具中國特色的是天臺宗和華嚴宗（又稱賢首宗），他勾勒出從宗出教的進途：實相禪布為天臺教，如來禪演出賢首教。這個脈絡非常清楚，不管是宗門還是教下，都是從禪觀行推演出各自宗派的教理系統。他在論述整個中國佛教的脈絡之後，感歎中國當時雖有融會禪教者，但可惜沒有依次第之建立。他說：「中國古時雖能會教明禪，然未能從教律之次第上，而穩建禪宗，致末流頹敗，一代不如一代也。」

在最後一章「中國佛學之重建」中，太虛大師認為道安、慧遠一系開創了中國佛學的主流。至於旁流，一為承傳龍樹、提婆學系的鳩摩羅什；一為承傳無著、世親學系的流支、真諦、玄奘等。這二思潮迭曾影響主流起變化，並吸收而又消化在主流裡。天臺、賢首、宗門下及晚期淨土行諸祖，雖迭受旁流的影响，仍還由保持著主流而演變下來。他總結漢傳佛教的主流有四大特點

：本佛、重經、博約、重行。所以他在第五章中提出，中國佛學的重建，第一、普遍融攝前說諸義為資源；第二、不是依任何一種古代宗義或某一種異地教派而來改建，而是探本於佛的行果、境智、依正、主伴而重重無盡的一切佛法。這就是說，不管是龍樹、提婆的中觀學派，還是無著、世親的唯識學派；不管是藏傳佛教、還是南傳佛教，統統成為中國佛教重建的資源。重建中國佛學，不是依某派宗義或某地宗派來顛覆自己本有的主流佛教，而是回歸到佛陀的本源。他還強調中國佛學的重建，必須進入到主流社會和精英人群中，落實到人間佛教的社會實踐和文化事業中，這樣的認識是很有見地的，也是非常深刻的。

太虛大師認為佛教必須高揚佛教智慧和慈悲的核心價值，改變目前的邊緣化狀態，進入主流社會。剝離反智主義和科學主義的雙重迷障，使佛學特別是漢傳佛學，成為現代文明社會中可信、可解、可行、可證的理論和實踐體系，應該認識到，這是世界漢傳佛教學者的共同願景。探索漢傳佛教的修學次第，重建制度和禮儀體系，從體到用，為人間佛教在社會中的弘揚，打下堅實的基礎。

同年，太虛大師在鎮江信眾歡迎大會上發表講話，他明確指出：「若以合理思想，道德的行為，推動

整個的人生向上進步、向上發達，就是菩薩，亦即一般所謂的賢人君子；再向上進步到最高一層，就是佛，亦即一般所謂大聖人。故佛菩薩，並不是離奇古怪的、神秘的，而是人類生活向上進步的聖賢。佛教，並不脫離世間一切因果法則及物質環境，所以不單是精神的。也不是專為念經拜懺超度鬼靈的，所以不單是死後的。在整個人類社會中，改善人生的生活行為，使合理化、道德化，不斷地向上進步，這才是佛教的真相。」

由此可見，經過抗日戰爭八年，民族劫難，社會動盪，人世間悲歡離合，將平時幾十年乃至上百年的變遷，濃縮成眼前所見所聞，太虛大師對佛教與人世間社會相結合有了更深入的悟解，佛教對社會的直接影響，作出更明確的解讀。

一九四六年秋，太虛大師應聘出任上海佛學院首任院長，在他主持下，聘請圓瑛法師為教導主任，受太虛之聘，當時佛教界一流人才：丁福保（佛學大辭典主編）、蔣維喬（中國佛教史著者）、應慈（華嚴座主）、圓瑛（獨步楞嚴之近代中國佛教界領袖）、芝峰（太虛之得意門人、《海潮音》編輯、《唯識三十論講話》譯者）、趙朴初（當時是年唯未滿三十的佛教界青年才俊）等都受聘到上海佛學院講學。英才雲集，太虛期望借此開創抗戰勝利後的新局面。

（未完待續）